

# 中国共产党八十年湖南图志



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 中国共产党八十年湖南图志

主 编 胡锦涛 陈清林 叶建军

副主编 楚 戈 刘歌宁 王小平 欧阳乐安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编辑组

胡锦涛  
王小平  
罗明标  
宋源美  
王国宇  
邹旭阳  
李彦长  
王志玲  
殷邵菁

陈清林  
欧阳乐安  
伍艳红  
贺吉元  
谢巨文  
余太平  
谢炳怀  
郭伟宏  
黄文先

李万青  
夏远生  
廖莉敏  
陈 义  
盛义良  
涂春堂  
段凤德  
唐红权

楚 戈  
马 娜  
万文俊  
禹丁华  
杨剑涛  
钟以田  
刘 嵘  
杨柳青

叶建军  
贺 正  
刘歌宁  
黄启昌  
龙正才  
杨国凯  
覃华臣  
周行易

# 历史概述





## 风雨征程八十年 功业卓著写辉煌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今天,已走过了80年的辉煌历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湖南的党组织也有了80年的光荣历史。回首80年,湖南人民既感觉历史的沉重,又平添胜利的喜悦,更增加对未来的信心。

### 一、中共湖南地方组织的创建及其领导下的工农运动

在近代,随着帝国主义的侵入,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开始裂解,城乡商品经济开始发展。湖南于19世纪90年代前后,也开始出现近代工业,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便有了较快的发展。与此相适应,湖南工人阶级队伍也迅速发展,到五四运动时期,约有近代产业工人4万人,随着力量的壮大,湖南产业工人已开始为自己的经济政治权利进行斗争。这就为党的建立奠定了阶级基础。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各种新的思想开始传入封闭的湖南,毛泽东等创建的新民学会等进步社团和《湘江评论》等进步刊物积极地传播着新的思想,推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长沙文化书社等进步书社,在传播新思想的同时,开始着重于传播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经过与李达、陈独秀等人的接触,也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蔡和森在法国就建党问题与毛泽东的通信等,这一切,为湖南党组织的建立准备了思想基础。而毛泽东、何叔衡等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骨干的成长,又为湖南党组织的建立准备了人才。这样,湖南党组织建立的条件已经成熟。

1920年冬,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成员有毛泽东、何叔衡、彭璜、贺民范等。1921年7月,毛泽东、何叔衡出席党的一大后,10月10日,湖南建立了全国第一个省支部——中共湖南支部,毛泽东任书记,何叔衡、易礼容等为支部委员,党员有彭璜、郭亮、彭平之、陈子博等10人左右。1922年5月底,按照中央的规定,成立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简称湘区委),书记毛泽东(后为李维汉),委员何叔衡、易礼容、李隆郅。下设长沙、安源、衡阳3个支部,共有党员30余人。1925年11月湘区委扩充领导成员后改称中共湖南区委。1927年5月上旬,根据党的五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议案》的规定,中共湖南区委改称中共湖南省委,夏曦任省委书记。

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即积极开展了4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是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他们扩大了文化书社,在各地增设分社,推销新书报,向湖南《大公报》、《劳工》月刊推荐刊载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重要文稿;把讨论建党的通信编入《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召开新民学会新年会议,讨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问题,集聚了一批赞成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骨干。第二是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党的一大前已发展团员39人。还成立了“中韩互助社”,支持朝鲜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第三是举办民众夜校和失学青年补习班,在向工人进行文化教育的同时,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

中共湖南支部建立后,着重抓了发展党团组织和创办湖南自修大学两件事。

1921年冬,毛泽东去安源开展工人运动,向工人进行阶级斗争教育,并派李立三去安源,建立了安源支部。接着又以衡阳县立三师“心社”骨干成员为基础,建立衡阳支部。团的发展方面,至1923年,长沙团组织有25个支部、236名团员,衡阳也有100人。常德、安源、平江等地都建立了团的组织。1923年12月,召开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湘区第一次代表大会。

为了培训干部,以适应斗争的需要,湖南支部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及其附设补习学校,以及以后的湘江学校。湖南自修大学首任校长贺民范,李达曾任学长。学校常为学员举办马克思主义的专题讲座,李达、陈独秀都曾

应聘为通函指导,邓中夏、恽代英、张秋人都曾来校讲演,毛泽东、李维汉也到校讲课。1923年11月湖南自修大学及其附设补习学校被赵恒惕封闭后,湘区委又续办了湘江学校。

中共湘区委及随后的中共湖南区委,以主要力量从事工人运动,推动了国共合作和北伐,组织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发展了革命的局面,建树了历史的功勋。

### 1. 掀起湖南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

党的一大后,1921年冬,毛泽东、何叔衡在长沙建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以专门领导组织工人运动,毛泽东任分部主任。湖南分部将党团员骨干李立三、刘少奇、郭亮、毛泽民、罗学瓚、夏明翰、蒋先云、毛泽覃等,分派到安源、水口山、粤汉铁路和长沙各产业、行业中,创办工人夜校,宣传马克思主义,领导工人运动。首先领导了湖南劳动立法运动,唤起工人的觉醒。在毛泽东的统一指挥下,李立三、刘少奇领导了安源罢工,郭亮领导了粤汉铁路罢工,蒋先云等领导了水口山工人罢工,长沙泥木及其他手工业工人也在共产党员的组织下,发动罢工,并相继取得胜利。

### 2. 推动湖南的国共合作

1923年前,由于受军阀的摧残,湖南只有一个国民党的省支部,没有基层组织,也没有什么活动。中共中央西湖会议决定实行国共合作以后,中共湘区委员会就提出一个从组织国民党入手进行政治运动的计划。1923年即派夏曦、刘少奇赴上海经林伯渠介绍参加国民党,夏、刘二人受国民党中央派遣回湘筹组国民党地方组织。9月,毛泽东以中国国民党总部派赴湖南的筹备员身份,与夏曦筹组国民党湖南总支部,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共产党员均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1924年8月,国民党湖南临时省党部成立,共产党员夏曦、何叔衡、李维汉、郭亮等选为执委,夏曦任执委主任兼组织工作,财政、宣传、农工、青年、妇女等工作均由共产党员担任。经过一年的发展,国民党在湖南17个县市建立了组织,有党员2754人。1925年5月25日至6月1日,在军阀掌权的条件下,国民党临时省党部在长沙秘密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建立了以共产党员为主体的国民党省党部。到1927年5月21日马日事变前,全省国民党党员发展到16万人以上,其中以农民居多。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基本形成。

### 3. 领导湖南的反帝爱国斗争

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建立后,以共产党员为骨干核心的湖南外交后援会、青年救国团和省学联等,恢复了公开活动,领导各界群众掀起了反帝爱国斗争的浪潮。1924年1月6日,省外交后援会和工、学团体3000余人,追悼1923年被日本人惨杀的150多位旅日华侨;6月1日,省外交后援会组织35个团体共5万多人,举行“六一惨案”周年大游行,实行罢工、罢课、罢市,提出“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等口号。7月26日,省外交后援会、省工团联合会、省学联发起组织湖南反帝大同盟。1924年底至1925年初还发动了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湖南成立青沪惨案湖南雪耻会,郭亮任主席,发动罢工、罢市、罢课,提出“不卖粮食给英日人”、“不吸英日纸烟”、退出英日人所办学校、工厂等口号,拟定对英、日经济绝交办法。这一反帝爱国斗争虽然遭到赵恒惕的威胁、恐吓和镇压,但在中共湘区委的领导下,各界进步力量坚持斗争,运动发展到全省40余个县。12月17日,长沙工人、学生数千人游行示威至大金码头时,烧毁了日商戴生昌轮船公司的趸船,强行收回了大金码头。平江县各界群众两次禁运英国煤油,在中共平江地方执行委员会的领导下,均取得胜利。蓬勃兴起的反帝爱国运动,为党培养锻炼了一大批干部,也扩大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

### 4. 动员群众支援北伐

1926年7月4日,国共合作的广东国民政府开始北伐,向军阀势力开战。中共湖南区委动员工农群众和各界力量,给予了大力支援。北伐前,湖南区委即派人做唐生智的工作,促使他加入国民革命军和北伐行列。北伐军进军途中,湖南区委动员工会、农会群众,给北伐军当向导,抬担架,备军粮,广大农民武装还参军参战,直接配合北伐军的作战。在攻占长沙时,省工团联合会组织工人抢了军阀部队的军械库,组织了1000人的工人保安队,分守省城八门及各要道,肃清敌军残余。宁乡县农协还派出300余人担任运输任务。北伐军向岳阳等地进发时,省工团联合会号召各地工会开展各种支前活动。长沙缝纫工人赶制了2万多个“国民革命”袖章,泥木工人准备了大批土炸药,印刷工人赶印宣传品,人力车工人组织了运输队。粤汉、株萍铁路总工会成立了援助北伐临时执行委员会,组织了运送队、破坏队、宣传队、侦察队、向导队和冲锋队。长沙工人运送队4000余人随军运送物资弹药到岳阳。在长沙县农协组织下,全县有1万余农民应征参加北伐。这一切,都有力地鼓舞了北伐军士气,从人

力、物力、财力等方面支援了北伐的胜利进军。

### 5. 开展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

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建立后,为农民运动的开展创造了条件。1925年2月,毛泽东回韶山,建立韶山党支部,领导了韶山农民运动。株洲八叠乡共产党员汪先宗也较早地开展了农民运动。1925年,中共湘区委三次选派91名党团员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为湖南农运培训骨干。接着,湘区委和后来的湖南区委也举办了短期的农运讲习班。各地开始成立秘密农协。北伐军入湘后,湖南区委利用当时的有利时机,大大地推动了湖南农民运动,湖南农运极一时之盛。到1926年11月,全省农协会员达136万多人,建立县农协或筹备处的有59个县,能直接领导的群众在600万以上。农民协会建立以后,政治上开展了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的斗争;军事上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经济上向地主阶级也开展了斗争,“平粟阻禁”,减少地租,废除苛捐杂税;还开展了可能的农村建设。湖南农民运动的兴起遭到来自党内外的责难。当此之时,中央农运书记毛泽东来湖南,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县农民运动,并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热情歌颂和肯定了湖南农民运动的历史功绩,回击了党内外对农运的责难。同时在湖南区委的领导下,省农协筹备处和省总工会在长沙召开了湖南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和工人代表大会,总结了全省农运、工运的经验与教训,纠正右的和“左”的错误,反击地主阶级反对农运的逆流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对农运的指责,把湖南工农运动推向新高潮。

湖南党组织创建以后,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发展了自己的组织,领导了工人运动的高潮和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积累了领导工农运动的经验。同时通过领导发动湖南农民运动,开始认识到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和农民的力量对于革命的意义。这种初步的探索和认识,为大革命失败以后我们党和毛泽东为探寻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提供了初步的基础。

## 二、党领导的起义与根据地的建立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湖南的反动势力也紧随其后,密谋大肆向革命势力反扑。为应付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中共湖南省委采取了一系列应变措施。马日事变发生后,党的组织和工农革命力量遭到极大摧残。但是湖南党组织仍坚持战斗,曾组织号召十万农军围攻长沙,因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影响,被命令停止进攻。

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共湖南省委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开始了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高举武装斗争的旗帜,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 1. 发动秋收起义,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临时常委会作出了发动秋收暴动的决定,并制定了湘鄂赣粤四省秋收暴动计划。8月,中央派毛泽东回湘协助省委领导秋收起义。为加强对起义的组织领导,省委决定组织由军事负责人组成的党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同时组织各县党组织负责人组成的行动委员会。起义总指挥卢德铭。9月初,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召开军事会议,部署秋收起义。会后,决定抛弃国民党的旗帜,组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3个团,分别由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平江工农义勇队、浏阳工农义勇队、湖北崇阳和通城的农军,以及江西萍乡、安福、莲花、安源的工农武装,湖南衡山、醴陵的农民自卫军组成。

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正式爆发,起义军一度攻克浏阳、醴陵。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起义部队失利。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各起义部队余部停止执行长沙暴动计划,集中于浏阳文家市,商议下一步进军方向。在毛泽东力争下,前委决定退往湘南,与粤北、湘南农军结合,执行原定的湘南暴动计划。

按照前委决定,秋收起义部队向萍乡进军。经过永新三湾村时,对部队进行了改编,决定将党的支部建在连上,营团建立党委,从而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10月3日,工农革命军到达宁冈县古城,在这里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总结了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讨论了在井冈山一带建立根据地的问题。经做好袁文才、王佐部队的工作,部队在茅坪安家落脚。27日,毛泽东率起义部队到井冈山茨坪,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 2. 湘南起义

马日事变后,湘南特委按照省委秋收暴动计划,于1927年11月至1928年1月,领导了一系列暴动。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余部在当地党组织的配合下,首先智取宜章。在此整编部队,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接着湘南



各县党组织配合主力,相继发动年关暴动,建立农军,一度占领各县县城,建立苏维埃政府。还开展了土地革命,插标分田。因蒋介石调集大军围攻,湘南起义部队在朱德、陈毅率领下撤离湘南,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组建红四军,开始共同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 3. 桑植起义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南昌起义军在潮汕地区失败后,贺龙、周逸群被派到湖南,领导湘鄂西地区的暴动。

1928年1月,湘西北特委成立,周逸群任书记,先后在湘鄂西一带恢复发展党的组织,为暴动作准备。3月下旬,组成了3000余人的工农革命军,贺龙任司令,贺锦斋为师长。4月2日,周逸群、贺龙、贺锦斋领导的桑植起义正式发动。部队很快夺取县城,建立了桑植县革命委员会。后在敌人围攻下,起义部队战斗失利。贺龙、周逸群失去联系,周逸群转移到洪湖地区领导武装斗争。

贺龙收集、整理起义部队余部,先后转战于湘西北一带。根据省委指示,湘西前委对起义部队进行了整顿,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8月1日正式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贺龙任军长。经过一年多的艰难奋战,在湘鄂西前委、地方党组织和红四军的共同努力下,到1930年5月,以桑植、鹤峰为中心的湘鄂边根据地,发展到十几个县份。1930年7月4日,贺龙领导的红四军与周逸群领导的红六军胜利会师,组成红二军团,周逸群任总前委书记兼军团政委,贺龙任总指挥,同时成立湘鄂西特委和湘鄂西联县政府。以洪湖地区为中心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开始形成。

### 4. 平江起义和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大革命时期,平江是湖南工农运动蓬勃发展的地区之一,较早地建立了党的组织和工农武装。1928年3月,平江党组织曾领导了数万农军扑城,有较好的群众基础。

在驻防南县时,独立五师一团团长彭德怀就加入了共产党,并在该团建立了秘密支部。独立五师调平江后,省委指示湘鄂赣特委书记滕代远与彭德怀联系,共谋起义。彭德怀和一团党组织立即着手起义准备。7月22日,起义部队在平江县城天岳书院广场集合,宣布起义。起义部队迅即占领县城,进攻独立五师师部,解除反动警卫队、挨户团、独立五师直属队等2000余人的武装,活捉伪县长。

24日下午,数万人在平江县城举行大会,庆祝平江起义的胜利,宣布正式成立红五军和平江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彭德怀任红五军军长兼第十三师师长,胡筠任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会议公审、处决了县长兼清乡委员会主任刘作柱等40余名恶霸地主。

平江起义爆发后,敌人急调10多个团的兵力向平江反扑。红五军在与敌英勇作战失利后撤出平江城,向平江、铜鼓、修水边界游击。9月17日,滕代远在铜鼓召开平、浏、修、铜4县党组织负责人和红五军党委联系会议,正式恢复和组成了湘鄂赣边特委,滕代远为书记。从此,开始了创建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1929年初,红五军突围离开井冈山,到赣南与红四军会合后,留下部分武装,由何长工、李灿、王佐等率领,就地坚持斗争,并与茶陵等四县的地方武装合编为红军独立团。到1930年,分别建立赣西、湘东根据地。1931年7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将上述两块根据地再加上赣西南特委的西路、南路、北路三个行委所辖的赣西地区合并为湘赣省,王首道任临时省委书记,袁德生任苏维埃政府主席。以永新为中心的湘赣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

在以上各次大的起义和暴动的同时,全省各地党组织也领导了一系列暴动斗争,有力地策应和支援了这些大的起义。其中有名的如1927年7月的宁乡“汾山暴动”、长沙“灰日暴动”、常德“石门暴动”、湘东“醴陵暴动”、安化“二月扑城”等。

### 5. 湖南党组织在曲折中发展

秋收起义受挫后,毛泽东率部队沿罗霄山脉向农村退却,湖南省委停止执行长沙暴动计划。为此,受到中共中央责备。9月27日,省委改组,彭公达为书记。10月24日,又改组省委,王一飞任书记。新省委继续执行全省暴动计划。由于暴露了党的力量,导致敌人的疯狂报复。1928年1月6日前后,省委书记王一飞等重要领导人相继被捕牺牲,另一些负责人任卓宣、苏先骏、袁达时、蔡增准等人先后被捕叛变,省委领导机关陷于瘫痪。各地党组织也遭到严重破坏。湘鄂赣边特委书记、湖南工运领袖郭亮,湘南特委书记陈佑魁、杨福涛,还有转移外地的著名领导人夏明翰等,也相继牺牲。

此后,省委又几度重建。1928年5月,在不知杨福涛牺牲的情况下,中央决定他担任省委书记,并派贺昌与

林仲丹一道来湖南恢复党的组织。后又屡遭破坏。1928年10月20日,根据中央指示,在上海组成新的省委,宁迪卿任书记。1929年3月,省委机关迁汉口,10月初迁湘阴工作。10月初,宁迪卿被捕叛变,省委机关遭严重破坏,不少重要领导人被捕牺牲。但各地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仍在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1931年9月,在长沙县铜官组建湖南省工委,徐少保任书记。1932年1月,中央决定将省工委改为长沙中心市委,行使省委职权。1932年12月底,中心市委因个别领导成员叛变而遭彻底破坏。此后,直至1937年底,湖南省委再也没有恢复,湖南白区人民的革命斗争,在较长时期内失去了党的统一领导。各地党组织和党员在艰难的条件下,继续进行着可能的斗争,如反对“清乡”、支援根据地的斗争、开展白区的思想文化斗争、推动抗日救亡宣传等。

这一时期湖南党组织及其领导人所领导的革命斗争,根本的意义在于开始进行武装斗争,逐渐懂得了枪杆子的重要性。同时开始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这就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之路。这一时期,在人民军队的建设方面,也开始积累了一些重要经验,如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军队内部的民主建设、军队的纪律建设等。逐步明确了军队的宗旨和任务。这些都为丰富中国革命的理论 and 人民军队的建设乃至中国革命的胜利,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

### 6. 红军长征和各地党组织的支援

中央根据地的红军在连续四次粉碎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围剿”后,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利,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万里长征。

1934年8月7日,红六军团7700余人在军团长肖克、政委王震的率领下,从江西遂川出发,开始突围西征。军团连续冲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先后经湘南、湘桂边境北上通道、靖县,入黔东南,在印江木黄与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改编而成的红三军会师。全军团西征历时80多天,途经湖南18个县市,跨越敌境5000多里,沿途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探明了沿途敌人兵力的虚实,查明了道路、民情,为中央红军的长征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红二、六军团会师后,发动湘西攻势,开辟建立了湘鄂川黔根据地,成立了湘鄂川黔省委,任弼时为书记。红二、六军团发展到2万余人。

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和中央机关共8万多人开始撤离中央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在先后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后,在突破湘江防线时付出重大牺牲,全军减员至不足35000人,作战部队伤亡超过三分之二。在分析敌情之后,经毛泽东力主,红军改变原定往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在通道转兵,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从而使红军避免了可能遭受全军覆没的命运,为红军开辟了一条生路。通过通道转兵,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开始得到多数领导人的赞同,为黎平会议乃至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奠定了思想基础。

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17000余人开始突围转移,在突破沅水后,转战湘中,经怀化出湘,进入贵州。

三支主力红军长征,经过湖南42个县市,得到湖南各地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和帮助。红六军团途经湖南境内时,在各地党组织和党员的组织发动下,人民群众主动给红军送信、带路、烧茶水、架浮桥、送弹药,接收伤病员,党领导的游击队配合行动,焚毁敌碉堡,破毁路桥,迟滞敌人行动。红一方面军途经湘南时,湘南特委在资兴召开各县党组织和游击队负责人会议,部署迎送红军的工作。特委领导游击队四处袭扰敌人,各县共摧毁碉堡、炮楼100多座。仅郴县县委就派游击队摧毁桥口、良田、城前岭等10多处碉堡炮楼,为红军顺利进军扫除部分障碍。地方党组织还帮助红军侦察敌情、探路导向,安置了上千人的红军伤病员。郴县县委在红军到来之前,发动群众筹集粮食12万多斤,光洋4000元,编织麻草鞋2.8万双,搭起安置伤病员的草棚11个。湘南特委委员谷子元和两名党员随军行动,协助开展民运工作。沿途有数以千计的汉族和少数民族青年加入红军队伍。红二、六军团途经湘中时,锡矿山工人家家门上插起小红旗,并推选代表迎送红军,帮助红军加工棉被。红军在湘中扩军5400多人,获得大量的物资补充。

## 三、党对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湖南留下的党员和基层组织,在何键专制统治的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也开始进行抗日救亡运动的组织发动。1933年春,以刘道衡为首的中央军委特科长沙工作组成员以合法身份作掩护,利用各

种社会关系,领导了长沙等地的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共产党员赵君实、刘乐扬、梁宜苏等组织了抗日大同盟,在长沙大中学校和新闻界发展盟员,作为党的外围组织,进行抗日宣传活动。一二九运动爆发后,特科长沙工作组和湘赣省委建立的长湘区委积极领导和组织广大青年和民众声援北平学生爱国行动。12月20日,在赵君实、刘乐扬、梁宜苏等共产党员的领导下,长沙上万名学生不顾何键当局和校方的威胁阻挠,上街集会游行,声援北平学生一二九运动。同年8月26日,湘鄂川黔军委分会发布了为号召全国民众保卫祖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宣言。在此前后建立起来的中共湘粤边工委、湘江特委、湘粤赣特委、湘南特委,在省委没有恢复的情况下,于坚持地方斗争的同时,大力宣传党的抗日方针,宣传抗日救国,推动了湖南人民的抗日斗争。

在党组织的影响下,长沙进步青年教师苏镜、唐荣前、廖申之、李涵葳等,在积极地寻找党组织的同时,组织起30多人参加的读书会,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活动。于刚、陈德明、曹国智等外地回乡的大学生也积极从事抗日宣传。1936年夏天,在京的湘籍共产党员谭丕模、李仲融,以及于刚、曹国枢、曹国智等人,与在长的进步青年苏镜、唐荣前、杨荣国等会合一起,利用暑假进行抗日活动,在长沙建立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还创办了《湘流》三日刊,共出40多期,影响较大。民先队还组织了抗日歌咏队,演唱抗日歌曲。于刚、陈德明还利用培德女校、自治女校开办两个补习学校,向工人、市民宣传只有抗日才能求得民族生存的道理。他们还组织了湖南文化界抗日救国会,通过1936剧社、《湘流》等宣传舆论阵地开展抗日宣传。长沙特科派赵君实参加文教会工作,并指示刘乐扬加入该会,争取利用《全民日报》宣传抗日救亡。西安事变发生后,共产党员刘乐扬为《全民日报》撰写社论,主张对内和平,对外抗战,赞扬张、杨两将军的爱国主张,要求团结抗战救国。尽管反动省政当局对刘加以迫害,然而共产党员的抗日救国宣传帮助人们认识了共产党的主张,将更多的人团结在党的抗日救国的旗帜下。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中共中央发出《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实行全民族抗战。嗣后不久,国共合作抗日,蒋介石同意西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军游击队集中改编为新四军。根据中央指示,中共湘鄂赣省委从抗战大局出发,开始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谈判。8月20日,湘鄂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又以快邮代电方式向全国发表《为和平合作联合宣言》,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军事委员会亦发出布告,表示愿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增强民族抗战力量。

与此同时,从平、津、沪、宁等地回湘的学生和文化人中的共产党员吕振羽、曹国枢、曹国智、孙伟、李仲融、谭丕模等,先后成立了“前进社”,创办了《前进》周刊、《民族呼声》旬刊、《火线》三日刊、《大众日报》、《现实》旬刊等报刊,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的方针,发动组织民众投入抗战。上述宣言、布告和刊物,反映了中共湖南地方组织团结抗日,期望组成湖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真诚愿望。

10月,湖南文化界中的部分共产党员,联络进步人士,发起组织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10月17日召开成立大会,吕振羽、田汉、翦伯赞、张天翼等23人当选为理事。文抗会成立后,组织讲演队、歌咏队、街头剧团、壁报团、慰劳团、难民指导委员会、读书会、时事座谈会、战时常识训练班,创办《抗战文化》、《农村周报》、《抗战小丛书》等刊物,宣传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慰劳伤兵难民,指导民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至年底,文抗会成员发展到800余人。12月19日,部分共产党员又发起组织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吕振羽、翦伯赞、谭丕模被选为理事,并创办《中苏》半月刊,宣传团结抗日、动员民众抗日的道理。

国共合作抗日以后,我党领导的在湖南及其四周坚持斗争的湘鄂赣、湘赣、湘南红军游击队,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同国民党合作抗日的指示,先后开始与国民党地方当局和军队的谈判,进行改编,开赴抗日前线。湘鄂赣省委一方面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继续扩大红军,保持高度警惕,防止国民党军队的突然袭击;同时提出了4项合作条件和5项停战条件两个方案,于1937年7月18日,派傅秋涛、涂正坤、刘玉堂、钟期光等为代表,与国民党军队第五十师的代表及平江县地方当局的代表,在平江嘉义镇开始谈判。7月22日,傅秋涛等人于国民党第五十师师长岳森等,在浏阳县城再次谈判,商定释放在押的政治犯;在浏阳县城设立红军的办事处;红军部队集中,番号“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游击支队”。8月20日前后,湘鄂赣省委又派刘玉堂等到国民党武汉行营谈判,并与中共中央派驻武汉的董必武取得联系,由董必武负责谈判。8月29日,谈判成功,武汉行营任命傅秋涛为抗日军一支队司令,并发放给养,部队在平江县长寿、嘉义两地集合。新四军建立后,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游击支队,奉命组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傅秋涛任支队副司令员兼第一团团,下辖3个营,共1100余人。1938年2月初,部队开赴抗日前线,并在嘉义设立留守处。接着湘赣边区的红军游击队组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一大队,段

焕竟任大队长,刘培善任政委,下辖3个中队,共300余人,于1938年2月开赴抗日前线。在湘南坚持斗争的两支红军游击队,1938年4月分别组编为新四军暂编第一大队和第二大队,共300人,开赴抗日前线。活动于湘东南的湘赣游击队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后,组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二营及第三营一部。

抗日统一战线在全国建立后,我党在西安、武汉、重庆、长沙、桂林等地设立八路军的办事处或通讯处。1937年11月26日,受中央委派,徐特立以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高级参议、驻湘代表的身份,王凌波以上校主任的身份,离开延安,来长沙建立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并于12月9日到达长沙。

当时,日军已占领上海,进逼南京,许多人对战争前途、民族命运担忧,到通讯处来访的不绝于途。通讯处工作人员根据党的一贯主张和抗战略线、政策,对来访者细心解释、答疑解惑。徐特立多次应邀在长沙市银宫电影院、火宫殿、第一师范等处公开讲演,宣传中国共产党对于抗日救国的主张。通讯处的工作人员经常会见各报记者,借助新闻媒体扩大党的抗日主张的宣传。通讯处还积极推动各界进步人士建立抗日救亡团体,创办抗日报刊,相继成立了工抗会、青年服务团等抗日团体,支持创办了《抗战日报》等报刊。徐特立、王凌波经常为这些报刊撰写社论、专文,对办报给予指导。在党内分工上,通讯处重点做上层的统战工作。张治中主湘后,对国共合作抗日持开明态度。徐特立多次找张治中商谈湖南抗日救亡的各种问题,使他接受、认同我党关于动员民众起来抗日的一些主张,允许建立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等抗日救亡团体,并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活动及抗日救亡工作提供了一些方便。1938年9月,国民党省政府、省党部决定成立民众抗战统一委员会,还选举徐特立为常务委员。此外,通讯处还开展了对其他国民党军政要人的统战工作,如刘岳厚、赵恒惕等,使他们在政治上同我党保持了较好的合作关系。通讯处还通过张治中,使一批被关押的同志得以释放。同时,通讯处积极为八路军筹集和转运军需物资,输送大批进步青年去延安、八路军、新四军工作。通讯处对内又是共产党的工作机关,为恢复和发展湖南的党组织做了大量的工作。

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国民党军阀的屠杀和摧残,湖南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除湘鄂赣边境、湘赣边境和湘南外,其他地方所剩无几。在长沙,只有刘道衡领导的中央特科长沙工作组,“文夕大火”前夕,特科成员一部分撤退至衡阳,建立清潭小学据点。1935年三四月间,湘鄂赣省委派李明秋、袁仲贤到长沙县铜官一带发展党的组织,5月下旬成立湘江特委。这两个党的组织活动范围虽小,但成为抗战初期湖南地方党组织工作的基础之一。平、津、沪、宁沦陷以后,一批文化教育界中的共产党员,如张天翼、翦伯赞、谭丕模、田汉,先后转来长沙,仅新建的国立联合大学中就有共产党员20多人。9月,吕振羽受北方局“回湘开荒”之命到长沙,与刘道衡取得联系后,团结文化教育界进步人士,以自治、含光女校、育英小学读书会为阵地,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外地回湘的这批共产党员,成为恢复湖南党组织的重要力量。

1937年11月,任作民受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和湖北省工委指派,回湘开展党的工作,先后建立了长沙临时大学和文抗会两个党支部。同时他派人到铜官、益阳、常德、湘潭、衡阳等地恢复和发展党组织。到年底,全省共成立区委2个,支部24个,有党员200多人。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湖南特委,以任作民、袁仲贤、罗其南3人为常委,任作民为书记。1937年11月,根据中央指示,湘赣临时省委改为湘赣边特委,谭余保任书记。12月,湘鄂赣省委改为湘鄂赣特委,涂正坤为书记,属长江局领导。12月下旬,中央派高文华、郭光洲、欧阳方、王铁铮到湖南工作。1938年1月,长江局决定将湖南特委改为湖南省工委,由高文华任书记。1月16日,由高文华、任作民、郭光洲组成的省工委在长沙秘密建立。

省工委成立后,便根据长江局的指示,以长沙为中心,在全省广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贯彻中央全面抗战路线,开展党的统一战线与群众工作,恢复发展党的组织。1938年1月25日创办了《观察日报》,后作为省委机关报,还支持田汉、廖沫沙创办了《抗战日报》。同时在全省各地设立战时书报供应所、新华日报推销处等,努力扩大党的抗日主张的宣传。1938年3月,还在平江、长沙、邵阳、衡阳等地举办党训班7期,训练区以上干部200多人。后来的省委还举办了塘田战时讲学院培训抗日骨干。5月,长江局又派聂鸿钧来湘,省工委由3人增至5人(增加聂鸿钧、谭丕模)。省工委还加强了军事工作,训练游击队骨干,在国民党驻军中发展党员。1938年7月,省工委改为省委,长江局增派蔡书彬参加省委工作。

省委建立后,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始了各县、市党组织的恢复和重建工作,先后建立了长沙市工委、南(县)、华(容)、安(乡)、石(首)公(安)工委,溆浦、岳阳、益阳、湘潭县工委,有党员800多人。1938年6月,湘南特委划归

省工委领导。到10月,全省共建立17个县委、10个县工委、5个特区委、特支或总支,党员发展到3000多人。省委建立后,又派人建立了常德中心县委、湘西工委、岳阳中心县委,党的组织有了很大的发展。

1938年11月12日长沙“文夕”大火后,张治中离湘,薛岳主政湖南。薛岳秉承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加紧了对湖南中共各级组织的破坏和摧残。省委机关、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和部分进步文化团体迁往邵阳,不久观察日报和塘田战时讲学院便遭封闭。平江惨案发生后,省委工作转入地下,省委决定分批撤退暴露了的党员干部去延安或新四军;对没有暴露的党员干部进行调整,以社会职业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各中心县委也迁入农村,党的工作由半公开状态转入秘密状态。八路军驻湘通讯处撤往桂林。为保存党的力量,党的组织进行了精简,到1940年11月,湖南省委由高文华、袁德胜、文士祯3人组成,省委机关迁至双峰永丰镇,省委直接领导的基层组织,只有湘宁、常益、邵阳3个中心县委和湘西工委,共有党员900余人。1942年6月13日,毛泽东指示周恩来:今后两年将是很艰苦、很困难的两年,为保存革命力量,要取消大后方的省委、特委一级机构,只留县、区委,必要时县、区委亦可取消,只留支部,各级干部转入支部工作。湖南省委根据这一精神,撤销了中心县委等机构,又撤退与隐蔽了200余名干部和党员。12月,根据南方局的指示,高文华、文士祯调赴延安,省委改为省工委,由周礼、张春林、刘鼎3人负责,全省党组织只有党员600余人,与组织保持联系的180余人。

在抗战后期,中国共产党积极领导了湖南沦陷区人民的对敌斗争,先后派遣新四军江南挺进支队和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进入湖南,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府,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湖南各地的党组织也纷纷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1943年9月,杨震东为支队长、张泽生为政委的新四军江南挺进支队,跨过长江来到华容桃花山,开辟了以桃花山为中心的石公华抗日根据地。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江南挺进支队频频打击日伪军,部队由40人发展到1000余人枪。

1944年11月9日,王震、王首道分任司令员和政委的八路军南下支队5000余人,从延安出发,于1945年3月到达平江。他们帮助建立了平江县委和平江县抗日民主政府,这是全省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4月,又建立岳阳县抗日民主政府和岳阳县抗日游击总队,开辟了湘阴抗日游击根据地。6月,南下支队根据中央命令继续南下,准备与广东东江纵队会合,开辟南方工作。8月初到达湘潭,与省工委书记周礼接上关系,并举行了联系会议,成立了周礼兼书记的湘中地委。南下支队到达湘南后,遭到国民党军队重重包围,被迫进入几十里不见人烟的八面山中。这时,日军投降,时局发生重大变化,南下支队从八面山突围后沿湘赣边界北返,回到鄂豫皖边区。南下支队在湖南转战半年,帮助湖南党组织进行恢复和发展组织的工作,先后恢复了平江、湘阴、岳阳、临湘、浏阳等县的党组织,留下了刘亚球、谷子元等一批干部在湖南,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对推动湖南以后的革命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抗战期间,湖南党组织经过艰苦的努力和积极的斗争,逐渐恢复和发展了被国民党反动派摧残的各级党组织,推动了抗日救亡局面的形成。国民党顽固派积极反共以后,湖南党组织再次遭受摧残,白色恐怖空前严重。然而留下坚持斗争的省工委和部分基层组织、部分党员,依然以职业为掩护,进行着可能的斗争。这批同志成为解放战争时期湖南党组织恢复和发展的基础,斗争的中坚。

#### 四、策动程潜、陈明仁起义与实现湖南和平解放

1945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的指示,各战略区随即调整部署。10月,省工委在长沙召开会议,讨论了抗战胜利后的形势和任务,确定了近期党的工作方针是:重新进入城市,到工人、学生中去建立工作基础,发动和领导城市民主运动;继续抓好农村工作,并在全省范围内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建立城乡工作据点。省工委由周礼任书记,刘亚球负责组织,张春林负责宣传。省工委机关设长沙。会后,调整了全省的领导骨干,刘亚球、张春林去湘乡,谷子元、李林、何大群去湘南,龙仲去邵阳,谢介眉、刘国安、王来苏、刘建安、刘东安等调长沙工作。此时,全省党员有700余人。县一级党组织有湘中地区的湘潭县特区工委、湘乡县工委和潭(湘潭)湘(乡)宁(乡)边区县工委。1945年11月,成立长沙县委,书记谢介眉。会后,全省党的工作较快地开展起来。

### 1. 各地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

1946年1月,省工委书记周礼到湖北大悟县宣化店,向中原局汇报工作。中原局负责人指示湖南要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注重党员质量,在发展中求巩固,在巩固中求发展,党组织要隐蔽,不要暴露;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进行合法斗争。2月,省工委在韶山召开会议,传达中原局的指示。会议增补罗振坤为省工委委员。此时,全省党组织已部分恢复,邵阳、长沙、衡阳、醴陵、浏阳、岳阳、耒阳、永兴、郴县、宜章等县都在省工委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

省会长沙是省工委工作的中心地区。1945年10月,省工委派党员打入《国民日报》在新闻界开展活动,随后又与湖南大学进步组织“人民世纪社”取得联系。1946年2月,成立新闻支部,6月发展为文教支部,由省工委直接领导。同年又派罗振坤和刘建安到长沙工人中进行工作,先后成立泥木工人支部、搬运工人支部。1946年初,周礼派朱汉樵去沈立人开设的文化书店工作,次年1月吸收沈立人等人入党,并建立支部。1946年7月,周礼兼任长沙县委书记,统管长沙市和长沙县党的工作,加强对市、县工作的领导。

1945年9月,省工委调张仲廉任潭湘宁边区县工委书记,以韶山为基地,领导潭湘宁边区的革命斗争;原湘潭县工委这时改为湘潭特区工委,周道任书记。在特区工委的领导下,从1945年9月至1947年12月,湘潭全县党组织发展到8个区委、49个支部,共有党员1235名,成为全省党员最多的县份。1946年,宁乡宗一中学也建立了特别支部,由省工委直接领导。

1947年4月,中共中央上海分局负责人在听取省工委书记周礼关于湖南工作的汇报时指出:针对目前蒋介石的镇压政策,我们在国统区工作中应扩大宣传,避免硬碰,争取中间分子,利用合法形式,力求在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湖南当前主要是发展和巩固党组织,在城市要抓紧学生运动,以学生为主开展群众爱国民主运动,进行合法斗争。5月,上海局又传达中央指示:蒋管区“党的组织要严守精干隐蔽,平行组织,单线领导,不转关系,城乡分开,上下分开,公开与秘密分开等原则。”

根据中央和上海分局的指示精神,省工委加强了各级党组织的建设。7月,周礼派谷子元去衡阳建立中共湘南工作委员会,由谷子元、何大群负责,统一领导湘南地区党的工作,主要任务是领导城市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和农村反征兵、反征粮、反征税的斗争;开始统战工作和武装斗争。8月,在华容成立中共湘北工作委员会,谢介眉任书记,领导华容、南县、岳阳等地的斗争。同时,省工委派雷天一、方用去常德恢复党组织,开辟湘西工作。1948年8月,成立邵阳中心县工委,书记龙仲,副书记叶苓。

此时,根据解放战争发展的形势需要,武汉市委成员陈克东被上海局派遣到长沙,将上海、南京、武汉等地转移到长沙的一些地下党员,组成中共长沙特支,由上海局直接领导。特支在工人和青年中成立工人解放先锋队、新民主主义青年社等进步组织,并在演剧八队等团体中建立了党支部。另外,还在岳阳、衡阳、益阳等地建立了据点。八九月间,省工委先后派黄道奇、刘国安到衡阳组建中共衡阳工委,黄道奇任书记,刘国安任副书记(次年6月改为两衡工委,书记刘国安),在衡阳、衡山地区发展党组织。同时,湘南工委在衡阳也建立了中共衡阳工委,书记谭善述,在衡阳城乡活动。此前,武汉市委派遣党员周济来衡阳开展秘密活动,建立了华东区直属衡阳支部。在地下秘密工作的环境下,这三个部分的党组织在不同的范围内开展革命工作,不发生横的联系。

1949年1月,省工委在长沙县委基础上组建了长沙市工委和长沙县工委,市工委书记沈立人,县工委书记刘建安。4月下旬,上海局为加强对湖南武装斗争的领导,派欧阳方来湘,增补为省工委委员。这时,省工委由周礼、罗振坤、欧阳方组成,周礼为书记。5月初,省工委在长沙市召开各地党组织负责人参加的武装工作会议,研究全省武装力量的领导问题。同时,省工委决定成立中共湘西工委,方用任书记;成立中共湘中工委,官健平任书记。在省工委领导下,几年来,全省党组织在斗争中发展、巩固、壮大。至1949年6月,全省已先后建立5个地工委,在26个县、71个区有党的组织,共有支部404个,党员7000余名。省工委在恢复、发展党的组织的同时,还在长沙、衡阳等地,建立了“人民世纪社”、“方生社”、“新民主主义研究会”等党的外围组织,这些组织成为党联系群众的桥梁,把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的群众紧紧团结在共产党周围,为湖南人民的解放而斗争。1949年5月,中共中央华中局建立,省工委改由华中局领导。

湖南各级党组织的迅速恢复与发展,成为湖南人民争取和平与民主的中流砥柱,为领导全省人民最后推翻国民党反动派在湖南的统治,奠定了基础,准备了坚强的领导核心。

## 2. 领导人民群众的斗争

各级党组织恢复发展后,立即领导了人民群众的爱国民主斗争。

首先是领导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早在1944年1月至1945年3月,湖大学生为反对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曾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驱李护校”斗争,斗争目标主要是驱逐反动校长李毓尧。但因缺乏党的领导而失败。斗争中的主要骨干汪澍白在出狱后找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听取了南方局青委领导人的指示,回校后建立进步团体“人民世纪社”,组织成员学习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等著作,宣传革命思想。1946年1月又发起成立有各进步社团参加的“湖南大学学术文化团体联谊会”,发表宣言,明确提出“坚持和平民主,反对独裁内战”,“世纪社”还创办《天下文萃》,宣传爱国民主思想。1946年4月,刘国安介绍汪澍白等学运骨干入党,建立湖南大学支部,汪澍白担任支部书记。从此,湖大的学生运动在省工委的直接领导下,蓬勃开展。1947年5月22日,在湖大支部的组织下,2000多学生渡过湘江,举行反内战反饥饿大游行。省工委派人帮助湖大支部总结了“5·22”大游行的经验教训,决定联合更多的学校学生,在6月2日“反内战日”举行大罢课和大游行。国民党军警闻讯后,封锁了湘江30里水路。湖大学生在船工的支持下,事先将30多只划子隐蔽在赵洲港。6月2日,300多名湖大学生靠这30多只划子渡过湘江,又由这30多只划子将集合在溁湾镇的1000多名学生接过湘江。然后,河东的湘雅医学院、明德、清华、一中、兑泽、长师、岳麓、衡湘、克强等校学生3000余人会合教育会坪,就南京5·20惨案向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要求惩办凶手,立即取缔《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保障人权,停止内战;并就各学校遭军警包围事件向政府提出质询,要求保证学生言论、集会结社、罢课、游行等自由。省政府官员被迫答应学生要求,游行取得胜利。此外,南岳各学校学生也在地下党员组织下举行了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爱国游行示威。学生运动中,一批进步分子得到锻炼,先后加入党组织,南岳各校建立了党支部,在各支部的基础上建立了南岳总支。

同时,在各地党组织的领导下,全省广大农民开展了“反对征兵、征粮、征税”的“三抗”斗争。城市工人则开展了罢工斗争。这些斗争汇成一股洪流,猛烈地冲击着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唤醒人民的觉悟,为湖南的解放创造了群众基础。

## 3. 党领导下的人民游击武装的兴起与发展

1946年11月6日,中央在《对南方各省工作的指示》中,要求南方各省在乡村积极创造条件,发动公开游击战争,建立游击根据地。省工委根据中央指示,开始着手武装斗争的准备,派出一批干部去湘南开展武装斗争,同时计划在党和群众基础较好的湘潭等县,开展武装斗争。1947年3月,省工委开始在湘潭、湘乡、宁乡等县工委和部分区工委配备军事委员,组织武装工作队或两面性武装,秘密进行活动。

1947年10月27日,桂东沙田进步青年郭名善等,在广东五岭地委干部、党员李康寿的帮助下,率领67名农民举行武装起义,建立了桂东游击队。经过整训后游击队被命名为粤赣湘边区人民解放总队北上先遣第一大队(简称湘边队),郭名善为队长,李康寿为政委。其后,他们与北江第一支队一道,返回桂东,开辟湘南游击区,不久,部队迅速扩大到200余人。

1947年12月,湘潭特区工委根据省工委指示,建立了以张鹏飞为队长的湘潭县武工队,特区工委军事委员胡佑生任政委。1948年2月,省工委派王来苏和原三五九旅南下支队留下的干部耿俊猛到武工队工作,由耿任副队长兼军事参谋。

1948年夏,周礼、刘亚球、罗振坤向上海局钱瑛汇报工作。钱瑛提出湖南分三线进行领导的意见,其中第一线,主要在湘南组织发展武装,开展游击战争。据此,省工委在8月根据香港分局的意见,决定将中共湘南工委划归中共广东五岭地委领导(实际上是湖南省工委和五岭地委双重领导),原省工委委员刘亚球分配到五岭地委工作。10月下旬,五岭地委召开扩大会议,着重讨论在湘南开展武装斗争的问题,决定将湘南也划分为三线实施领导。第一线桂东、汝城一带,与粤北支队配合,开展武装斗争,由刘亚球、李林负责。第二线,汝城、桂东以西到粤汉铁路以东,发动群众反征兵、征粮、征税,从人力物力财力方面支援第一线,并积极准备武装斗争,由谷子元负责。第三线,沿粤汉铁路从衡阳到广东边界的城镇和乡村,积极开展学生运动和工农运动,为第一线培养、输送干部,收集传递情报,由何大群负责。会后,湘南地区的游击武装迅速发展起来。湘边队恢复公开活动;1949年2月,李林、耿俊猛建立汝城独立大队;王来苏在耒阳建立游击队,永兴、安仁、郴县、资兴、桂阳、临武等县也相继建立一些游击队或武工队。

在湘中地区,游击武装斗争也风起云涌。1949年2月,姜亚勋、李石敏等在宁乡黄绢乡率70余人建立游击队,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袭击了敌警察所、乡公所,夺得一批武器装备;还有聂昭良等领导的湘乡桥头河暴动,刘资生等领导的湘中里武装起义,莫新春、唐道光领导的邵阳白仓起义,李建中、张大野领导的邵阳东乡武装起义及安化、湘潭等地其他的武装起义。

在湘西北地区,1949年1月,蔡得夷在益阳保林冲组织矿工起义,建立一支100余人的游击队;张乐、张文达、刘静安等率领益阳大冲煤矿工人起义,建立了“湖南人民解放矿工游击支队”;张光俞率领益阳太吉乡南坝山农民起义,建立一支50余人的农民游击队,这几支游击队不久合并一起,统称“矿山游击支队”,是一支有250余人枪的工农联合武装。此外,湘阴、醴陵、攸县、酃县、东安也相继发动了一些起义,建立了一批游击武装。

在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形势的推动下,一些国民党爱国人士也积极与中共湖南地方组织联手,表示愿意站在人民一边,为解放湖南作贡献。1948年底,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农工民主党湖南的领导人武思光,在溆浦一带组织湘西人民革命军,开展武装斗争。1949年4月,邓胥伯受民促社总干事陈采夫的指派,在慈利组建了一支地下武装,队伍发展到100余人。

遍及三湘四水的武装起义,汇成了人民战争的滔滔洪流,动摇着国民党反动派在湖南的统治。

为加强军事斗争和全省武装力量的领导,更好地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湖南,1949年4月底,华南分局派欧阳方来湖南,任省工委委员并负责军事工作,先后举办了军事学习班,培训游击武装干部;考察了各支游击队伍,确定性质,充实其领导力量,先后派出一大批党员骨干到姜亚勋、李石敏、莫新春等部做政治工作。5月初,省工委在长沙召开有各地党组织负责人参加的全省武装工作会议,决定加强武装斗争,成立“湖南人民解放总队”,对全省武装力量实行统一建制,统一领导。会后,发出了进一步开展全省武装斗争的“五四”指示,发布了《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成立宣言》。省工委对各支游击武装授予了番号,统一建制,统一领导。以宁乡姜亚勋等人领导的游击队为主,会合湘潭、湘乡、安化、益阳、宁乡等县游击队,编成“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中第一支队”,姜亚勋为司令员,官健平为政治委员。活动于邵东、武冈地区的游击队编为“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中第二支队”,尹如圭为司令员,龙仲为政治委员,尹如圭牺牲后叶苓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石敏等领导的游击队编为“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中第三支队”,李石敏为司令员,张伯伦为政治委员。活动于长沙、浏阳边界的湘赣边区人民自救第一纵队与陈金财部和浏北游击队合编为“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东第四支队”,彭汉云为司令员。以湘南人民赤色游击队为基础组建了“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中五支队(一团队)”,李建元为司令员,黄道奇为政治委员,在衡西北地区活动。

6月21日,湘南工委在耒阳大义乡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粤赣湘边区人民解放军湘南游击司令部,谷子元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何大群为政治部主任。6月22日,根据华南分局3月的电令,成立湘南地委、湘南支队,刘亚球任地委书记、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同文任地委副书记兼支队副政治委员,李林任支队副司令员,耿俊猛任支队参谋长,唐麟任支队政治部主任。7月底,湘南地委、湘南支队重新划归省工委领导。

根据省工委的决定,湘西建立了湖南人民解放突击总队,陈采夫为总队长,方用为政治委员。经省工委同意,湘西还在溆浦、辰溪一带,建立了“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西纵队”,司令员陈策,政治委员谌鸿章。湘北建立了“湘北人民自救军”,龙赞为司令员,任纪汉为政治委员。还有外省在湘的党组织领导的游击武装,如湘鄂西地下党领导的江南游击队,衡阳工委领导的湘桂边湘南人民民主联军,华中局联络部代号“3130”地下组织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江南地下第四军第十一师;江汉军区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湘南游击司令部,湘鄂西中心县委领导的江南游击支队等等。到8月,湖南党组织领导的游击武装发展到3万多人,省外党组织领导的游击武装约4000多人。

在省工委的领导下,全省各支游击队积极配合人民解放军在湖南的进军,消灭了不少顽抗之敌,解放了不少县城,为湖南的解放作出了贡献。游击队完成历史使命后,奉令集中整编。湘中一支队分别编入益阳军分区独立第一、二团和部分县大队;湘中二支队分别编入省军区独立第十七团和邵阳军分区独立团及部分县大队;湘中三支队编入益阳军分区独立第二团;湘中五支队编入邵阳军分区部队;其他各支游击队也分别编入有关军分区部队。

#### 4. 争取程潜、陈明仁起义和湖南和平解放

1948年6月,程潜竞选国民党副总统失败后,回湘担任省政府主席兼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统辖湘赣两省。他一方面表示反共,同时又在为自己考虑后路。省工委分析了程潜的全部历史和当时矛盾的言行,认为争取他站到人民方面来,走和平道路是有可能的。于是决定加强统战工作,成立统战工作小组,由中共党员余志宏任组长,主



要成员有涂西畴等。工作首先从程潜部属做起。省工委决定邀请程潜的族弟程星龄回湘,通过他做争取程潜的工作。同时争取了一批程潜周围的中上层人士。经过各方人士的劝说,程潜审时度势,决心脱离蒋介石政权,走和平道路,并委托程星龄与地下党联系。中共上海局了解这种情况后,同意省工委进一步开展争取程潜的工作。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和平谈判8项条件。程潜拥护7项,对“惩办战犯”一条心存疑虑。省工委委托程星龄转达诺言:只要他站到人民方面来,不仅不会算旧账,而且会受到应有的礼遇。不久,中央和毛泽东、朱德也表示:一切战犯,如能认清是非,确有事实表现,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准予取消战犯罪名,给以宽大待遇。这使程潜消除了疑虑,坚定了起义的决心。

1949年2月,陈明仁率二十九军和七十一军回湖南,不久兼任长沙警备司令。为了做好争取陈明仁的工作,省工委确定由涂西畴直接联系第一兵团参谋长于文一,多渠道地对陈明仁及其兵团开展统战工作。同时程潜也不断给陈明仁以启发,暗示他有与共产党合作、实现湖南局部和平的意愿。在各方面的推动下,陈明仁向程潜表示,愿意听从颂公领导,拥护和平主张。并指定专人与省工委代表余志宏联系。陈明仁在东北四平与人民解放军交战过,因此他对共产党心存疑虑,害怕算旧账。对此,省工委向他宣传我党对起义人员“既往不咎,立功受奖”的政策,解除他的思想顾虑。同时,章士钊还委托程星龄转达毛泽东对陈明仁既往不咎的谈话,这就进一步坚定了陈明仁起义的决心。同时,省工委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广泛深入发动群众和各界知名人士,进一步开展声势浩大的反对假和平、争取真和平的群众运动,促使程潜和陈明仁走和平道路。

1949年5月14日,我第四野战军强渡长江,解放武汉三镇。白崇禧集团南逃,退守湖南、广西,镇压湖南的和平运动,向程潜施加种种压力。

程潜在和平起义遇到严重阻力的情况下,一方面要求与省工委负责人直接见面商谈,表示愿意接受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走和平道路,一方面通过各种渠道,与中共中央联系。嘱李达向毛泽东表明自己愿意走和平道路的意愿;又选择唐鸿烈作代表去香港找共产党组织,中共驻香港代表乔冠华接见了唐鸿烈和李默庵。中共中央看到乔冠华有关情况的报告后,由周恩来代表中央指示乔冠华认真进行工作,争取程潜、陈明仁站在我们方面。同时,上海局、第四野战军也秘密派人到长沙,负责有关联络工作。

在省工委的工作和各方面的推动下,6月,程潜向省工委递交了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备忘录》,表示:“爰本反蒋、反桂系、反战、反假和平之一贯态度,决定根据贵方公布和谈八条二十四款之原则,谋致湖南局部和平。”华中局收到省工委的报告和程潜的《备忘录》之后,根据中央的指示,同南下省委负责人王首道等进行了研究,作出了中央、华中局关于程潜起义和湖南迎接解放的指示,华中局还专派洪德铭秘密来长沙,向省工委传达上述指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收到程潜《备忘录》后,毛泽东于7月4日亲笔复电程潜:“先生决心采取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极为佩服。”表明对程潜的信任并给予鼓励。同一天,中央军委给林彪、邓子恢发电报,指出:“我们认为程潜态度是好的,应极力争取程潜,用和平方法解决湖南问题。”随后不久还特别指出:“争取程潜、陈明仁及其一派站在我们方面,对于分化台湾、广州、广西、昆明、四川等地国民党,特别是分化台湾及宋希濂等部有极大的政治作用。”

程潜收到毛泽东的复电后,十分高兴,随即派刘纯正去汉口,与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联系,要求解放军从速入湘,省工委也派地下交通员同去担任向导和联络。

7月,四野部队相继解放平江、浏阳、岳阳、华容等县,并继续南进,白崇禧撤退长沙。四野派出首席代表金明,代表唐天际、袁任远、解沛然、李明灏组成的代表团,从武汉来长沙准备与程潜、陈明仁派出的代表团谈判,于7月22日到达平江。程星龄等前往平江迎接,李明灏先到长沙,会见程潜和陈明仁并达成协议:成立以程潜为主任的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成立以陈明仁为主席的临时省政府;所有起义部队集中整训改编,程潜、陈明仁即迅速进行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

8月3日晚,程潜致电毛泽东、朱德及本省各军政机关,宣布正式脱离广州政府。8月4日,程潜、陈明仁领衔发出有37名将领联名的起义通电。毛泽东复电起义将士,对他们的义举予以高度赞扬和祝贺。8月5日,各界知名人士唐生智等104人发出通电,响应程潜、陈明仁起义。5日晚,人民解放军第一三八师分三路进入长沙市区,长沙市数十万群众夹道欢迎解放军进城。

解放军和谈代表团入城后,自8月8日起,同湖南地方和谈代表团进行了会谈,双方就两个主要问题达成